

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

——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

张 震

摘 要: 以现实的社会条件为基础,1982 年宪法形成了以发展性、时代性、中国性为核心的人权逻辑主线。随着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982 年宪法的人权体系也在不断地扩充与演进,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需要与成果的经济权利的凸显,到具有普适性人权价值的确认,再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即广义社会权体系的完善。在当下,公平享受发展成果,权利的平等保障是 1982 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最核心命题与最终极价值。

关键词: 八二宪法; 人权; 权利;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D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8330(2012)06 - 0032 - 07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宪法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宪法学的理论支点。但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这对宪法中的基本矛盾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按照近代自然法学说,国家权力是由公民权利派生和转化而来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来源和运行目的都是公民权利。因此,公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与终极目的。而人权是对公民权利的概括与抽象,所以,人权是对宪法的正当性进行考量的核心价值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启动制宪权,于 1954 年制定出第一部宪法;启动修宪权,对 1954 年宪法全面修改了三次,即制定 1975 年宪法、1978 年宪法和 1982 年宪法。而 1982 年宪法普遍被认为是我国制宪史上最好的宪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 1982 年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年之际,以宪法的核心价值——人权来检视,以求其进一步完善。权利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具有内在的勾连性,“权利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因此,对 1982 年宪法的人权及权利的检视须放在我国三十年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进行才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及现实意义。

一、承启与扬弃: 人权逻辑的主线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宪法,1954 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充满着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尊重,充满着对人权的关怀。该部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历时两个多月,全国有 8000 多人讨论,提出了 5000 多条意见,采纳了百余条,草案公布后,交全国人民讨论 4 个月,参加讨论的人达到 1.5 亿,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共 118 万多条,整个制宪过程的民主风气非常浓厚。^②有学者从历史价值上高度评价 1954 年宪法是马

【作者简介】张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研究人员,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 页。

②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3、227、181 页。

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③1975年宪法制定于文革后期,当时的政治形势及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对人权价值的轻视甚至无视;1978年宪法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对人权的普适价值无法给予足够的认可。1982年宪法是在文革结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制定的,不管是制宪权主体中的一般民众,还是领导者自身,对于不讲民主与法治的危害均有切肤之痛,因此对于人的尊严的尊重,以及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相比,1954年宪法更具现实性。

从四部宪法的集中规定权利条款^④来看,1975年宪法中的权利条款最少,而且争议及问题最多;1982年宪法中的权利条款最多,但是1954年宪法中的罢工自由和迁徙自由,并没有规定在1982年宪法中。通过对比,可分析出1982年宪法的人权逻辑主线。

(一) 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发展性。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是相承继的关系,在1982年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权利中,除了人格尊严及批评、建议、申诉和检举权均在1954年宪法中有明确规定。^⑤1982年宪法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人权逻辑迥然不同,其权利条款是对二者的扬弃。1975年宪法的权利条款在义务条款之后,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的理论关系;将拥护党的领导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混淆了宪法中的政治条款与权利条款;在具体权利的规定上,甚至连平等权这一宪法学上公认的原则性权利亦不规定,其人权逻辑是对普适性人权价值的不尊重甚至无视。1978年宪法与1975年宪法的人权逻辑基本一致,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公民的权利是非常荒谬的,甚至在不规定一般平等权的情形下,强调妇女的平等权,其人权逻辑也是自相矛盾的。

(二) 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时代性。人权除了具有普适性价值,也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1982年宪法中权利的规定基于当时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时代背景并希冀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如在1982年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和民众提出恢复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⑥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世界其他各国的宪法及国际性人权文件中,均有明确规定。我国1954年宪法虽有规定,但由于1954年宪法实施条件的不断变化,以及《户口登记条例》的出台实施,使得该项权利几乎虚置。1982年宪法制定之时,虽然改革开放已实施几年,但是由于制度的障碍以及迁徙自由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足够具备,因此,即便在1982年宪法中规定此项权利,其现实意义也不大,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相符。

(三) 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中国性。1982年宪法的权利条款立足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意在解决我国自身的问题。从世界宪法史来看,1919年以后进入现代宪法阶段,二战结束以后,宪法的理念及权利条款又产生了进一步变化,诸如环境权和知情权,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渐流行,纷纷写入各国宪法。我国在制定1982年宪法之时,如果从顺应世界宪法发展趋势的角度,似乎应对该两项权利予以交代,但是该两项权利似乎对当时的我国社会并无特别的意义,因此,在权利部分并未对体现当时世界潮流的该两项权利予以明确规定。

二、规制与偏重:经济权利的凸显

人权无论是作为一种要求、一种政治主张,还是作为法定权利,它的产生、实现和发展都必须以一定社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⑦在权利体系中,经济权利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权利的偏重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文革结束后,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经济的增长、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重中之重,这是1982年宪法制定时的基本历史及社会背景。1982年宪法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宪法,发展的宪法,而当时改革与发展的重心在于经济领域,因此,该宪法的重大历史及社会使命即是推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优先的思路

③ 前引②,第277页。

④ 具体参见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及1982年宪法。

⑤ 1982年宪法中所规定的外国人权利在第32条,位于宪法文本的第一章“大纲”,而非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因此本文此处没有列举。

⑥ 前引②,第573页。

⑦ 参见刘翰、李林《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初论》,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

无疑会影响1982年宪法中权利条款的配置。尽管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的权利条款构成一个以发展性、时代性及中国性为基本逻辑的有机体系,但经济权利条款似乎在1982年宪法文本及历次宪法修正案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这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最直接满足,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最直接体现。

所谓经济权利,其最核心的因素是正当的经济利益。从1982年宪法集中规定权利条款的第二章看,在第33—50条的权利部分中,直接属于经济权利的条款似乎不是很多,分别是第42条的劳动权、第43条的休息权、第44条的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以及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但事实上,在我国,除了1982年宪法第33条的平等权、第34条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36条的宗教信仰自由、第38条的人格尊严以外,其他权利与经济权利或者说正当的经济利益均有直接或间接的较密切关系。比如商业性言论、营利性结社、人身自由的实现、住宅的持有、通信自由、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男女同工同酬等均与正当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1982年宪法制定、实施、修改所具备的特殊的社会及历史背景,在权利条款上表现出经济权利的凸显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及调整的不断进行,在1982年宪法的历次修正案中,关于经济制度的条款亦占有较大的比例。1988年修正案共两条,涉及私营经济的地位及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从内容上看,均属于经济制度;1993年修正案共9条,直接涉及经济制度的有6条;1999年修正案有6条,直接涉及经济制度的有3条;2004年修正案共14条,直接涉及经济制度的有4条。由于公民权利与制度保障的内在联系,经济制度的条款中均涉及到经济权利。1988年修正案第1条确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营经济的贡献。修正案第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正是因为该修正案的存在,才使得我国公民可以拥有房屋产权,而“居者有其屋”历来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经济权利。1993年的相关宪法修正案对于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和利益进行了较合理的配置。1999年的相关宪法修正案通过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规定,对于我国公民等不同主体的经济权利及利益的保障提供了基础性保障;通过对农村经济形式的调整,对农村居民的经济权利及利益的完善提供制度支持;通过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进一步确认保障非公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及利益,同时为全体公民享有非公经济发展的成果提供了制度前提。2004年修正案涉及经济权利及利益的主要是对土地制度、非公经济形态的进一步保障及调整。

私有财产权的完善及公共利益的规定是2004年修正案中涉及经济权利的最核心、最有意义的条款,该两处修改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1982年宪法经济制度修改的日臻完善。私有财产权是公认的三大基本人权之一,而且即便在三大基本人权中也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是生命权、自由权等实现的物质性前提与保障。^⑧财产权不但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重要法律现象,更构成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一大法律支柱。^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有助于经济繁荣,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的个人财产权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人类自由的现实保证。^⑩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3条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私有财产权的概念没有明确提出,而且私有财产保护的范围也不够准确及全面。2004年宪法修正案使得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在权利理念上,既符合世界宪法发展潮流,又合乎我国实际情形;在逻辑结构上,既有保障条款、又有限制条款和补偿条款;其权利价值及规范效力皆为修正案中的权利条款之典范。公共利益内容的修改第一次在我国宪法文本上提出这一世界各国宪法中已普遍规定的概念,^⑪不但合乎权利限制的原理,而且明确了权利限制的底线。

需要指出的是,与前几次修正案相比,2004年修正案中直接涉及经济制度条款的比例在降低,而且从1988年修正案到1993年修正案再到1999年修正案以及2004年修正案,呈现逐次降低的态势,这表

⑧ 参见文正邦主编《宪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⑨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⑩ 参见张千帆《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8页。

⑪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348页。

明了1982年宪法修改的重心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与我国近年来由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转型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因此,1982年宪法权利条款中经济权利为重心的格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私有财产权的修改是宪法上经济权利完善最主要的成就及标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宣示着以经济权利为重心的权利体系演绎及发展的转变。

三、尊重与保障:人权价值的确认

2004年修正案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权入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宪史上的一大创举。从对人权的批判到承认以及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再到宪法的明确宣告,人权概念在我国走过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曲折的进程。人权是评判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如果政府保护人权,那么它们本身及其活动就是合法的。^⑫人权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从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反映了国家与执政党的人权观与宪法观的深刻变化。^⑬在我国法学界,比较通识性的观点是,“人权”一词起源于西方。^⑭“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⑮1991年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开篇即写道“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⑯《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权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共同标准”。

从治国方法来看,人权富于法治精神。人权原则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奠定基础。人权为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提供了较好的方法。^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我国宪法特有的人权表达方式,使得我国宪法文本上首次同时出现了“人权”和“权利”的概念。很多学者认为“人权”和“权利”的概念可以等同或互换。事实上,有必要在“人权”和“权利”两个概念同时出现在宪法文本上后予以明确的回应和解答。其一,人权的主体是人,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当然,除了自然人,法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也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⑱在实证法上,人和公民的概念需要转化,而不是简单等同。其二,人权既可以是法律权利,也可以是道德权利,人权普遍被认为是“天赋”的,“自得”的,而权利最终要依归于法律文本。因此,笔者认为,“人权入宪”后,我国宪法文本中“人权”和“权利”的关系,包括人权与权利的价值与功能,人权与权利的表现形态,人权与权利的转换等,均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能仅仅从法本身的角度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进行解读。事实上,“人权入宪”是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背景下,国家对人权的态度转变及公民对人权的意识觉醒在宪法文本上的集中反映。作为一项重大的法律发展成果,“人权入宪”标志着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新发展:一是普适性价值的尊重与我国自身国情的结合。如前所述,1982年宪法所构建的权利体系目的在于回答和解决我国文革结束以后所面临的现实中的权利问题,2004年的人权修正案则拉开了中国宪法文本的人权视野,提升了对普适性人权价值的认知。二是权利的抽象性保障与具体性规定的结合。1982年宪法文本对权利的规定采取的是列举的方式,强调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保障,2004年的人权修正案有效弥补了权利列举保障的欠缺,起到了对权利概括性保护的作用。

四、守“旧”与创“新”:权利课题的延伸

1982年宪法所构建的权利体系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历次修正案直接涉及权利的条款并不多,而且几乎均以经济权利或经济利益的形式显现;而2004年的人权修正案,为公民权利的完善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定的立场、更为开阔的空间和更为现实的需求。除了法内因素,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强化等法外因素,亦会推动1982年宪法权利体系的发展。

⑫ 参见[美]杰克·唐纳里《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王浦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⑬ 参见韩大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⑭ 参见徐显明主编《国际人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⑮ 刘海年、王家福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⑰ 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80页。

⑱ 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学》,林来梵、凌维慈、龙询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

(一) 现有权利完善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 权利来自一种反映个人在某种生产方式中所占位置的基本经济关系,因此,应当将经济和社会权利优先于公民和政治权利。^①从世界宪法权利发展的趋势看,二战以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发展成为重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正在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全面的社会建设。因此,综合上述几个因素,1982年宪法现有权利体系完善的重心应放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

从1982年宪法文本看,第42—50条的内容基本上均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范畴。笔者认为,围绕这些权利需要展开研究的课题包括:(1) 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休息应当是每个人、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休息权的主体不应当仅限于劳动者。《世界人权宣言》第24条规定“人人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均规定劳动者的休息权,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参加劳动、热爱劳动而具有劳动者身份后的休息权予以肯定、保障之旨趣可以理解,但是不够科学。制宪以一国政权的存在及意识形态等为前提,但是在政权确定后,立宪的技术性及科学性是宪法文本完善的基础。(2)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物质帮助权是国家在经过充分的社会化阶段以后,公民所具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最早规定在《魏玛宪法》中。物质帮助权属于典型的社会权,^②该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1982年宪法规定此项权利,一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及要求有关,二则具有一定的权利保障的前瞻性。但是,从目前来看,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前提仅限于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三种情形,其保护范围明显过窄,无法适应公民需要获得物质帮助的新变化;另外,物质帮助权的保障机制也应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否则该权利可能流于虚置。目前,法学界对此项权利的研究开展较少。(3) 宪法第48条规定的妇女平等权也值得商榷。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逻辑上讲,该规定已包括妇女平等在内的各种情形;再者,即便考虑到妇女在我国是特定主体或弱势群体,但仅单独强调一种特殊群体的平等权保障,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二) 新兴权利入宪

宪法上的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自从近代意义的宪法出现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变化,不断地有新权利补充到宪法权利体系中。公民权利的扩充,是各国宪法普遍的发展规律,也是多种版本的法学教科书所认为的宪法的发展趋势之一。^③人权概念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④学者们也在不断研究新兴权利入宪的问题。^⑤目前来看,迁徙自由、知情权、环境权等入宪的呼声较高。

新型权利入宪的逻辑要符合几个要素,即基本权利属性的证成、独立的权利价值以及入宪相关现实条件的具备。笔者在此以环境权为例,来论证新兴权利入宪的逻辑。尽管宪法权利和基本权利并非完全等同,但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概念,宪法权利是实证化而且是宪法化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首先必须是基本权利。^⑥因此,一项权利入宪首先必须论证其基本权利属性。Robert·Alexy认为,一项权利之所以能成为宪法上的权利有三方面的因素,即能够被大家理解的实际意义、政治正当性以及高于法律权利的位阶。^⑦从环境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对人们自身生活需求的意义、对人们政治生活的意义以及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可以得出环境权的不可或缺性;从环境权与生

^① 参见[英]R. J. 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地、黄列、朱晓青译,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② 前引①,第691页。

^③ 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章第一节;文正邦主编《宪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章第一节。

^④ 前引③。

^⑤ 据初步统计,通过中国期刊网可以搜索到的以“新兴权利入宪”为题的文章,从1994年至2011年间共有约190篇。

^⑥ 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⑦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ix.

存权、健康权、住宅权等权利的不同,可以证成环境权的独立权利价值;从环境权与人的尊严在当代的密不可分性可以证成环境权的高权位阶。

当然,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属性的证成,仅仅是环境权入宪的理论前提。探讨环境权的入宪,还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我国现有宪法文本中是否已规定或者含有环境权的内容;其二,能否通过宪法解释从现有的宪法条款中推导出环境权;其三,环境权入宪的独特价值。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1982年宪法中,与环境直接有关的条款分别是第9条和第26条。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第9条讲的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第26条讲的是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1982年宪法制定之时,世界各国已经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并且已开始提出环境权的概念,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位置,与世界各国交流较少,自身开放程度低,因此,可以判断,在1982年制宪时,我国对当时的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权勃兴的世界潮流应该是没有形成自觉反映的。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既然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那么可否通过宪法解释,推导出环境权呢?在笔者看来,就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和第26条的规定看,启动环境权的宪法解释可能存在以下障碍:其一是解释空间的不足。1982年宪法上的环境保护条款,一则没有明确的环境权利的含义,二则没有公民环境义务的含义,尽管有“国家保障、国家保护”的字眼,但是国家的职责性指向及权力担负性都不是很明确,似乎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的一种原则性政策导向。其二是制宪目的上的缺失。保障环境权应该是世界各国宪法的发展趋势之一,但作为一项新型的而且相当复杂的权利,环境权的理念与传统的宪法理念具有一定的不一致性,如果过度扩张解释出宪法文本中本没有包含的环境权,会带来解释结果与旧有宪法理念的一定冲突,违反宪法解释的客观性原则。事实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可以判断出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在当时对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并无意识性。

就第三个问题而言:(1)环境权入宪通过保障公民的环境利益,形成公民的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以及国家的环境保护职责等三者的有机互动,使得人与自然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在资源紧张甚至发生危机的现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人与人和谐的物质前提,也是人与人和谐的追求状态。(2)环境权的宪法化有助于人更有尊严地生活。人的尊严本是我国宪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有学者认为,人性尊严属宪法价值秩序之根本原则,甚至,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已成为价值体系之基础。^{②6}不管是克服生态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环境权都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环境权正是为了破解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难题,是为了人类更有“尊严”地在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延续,从此意义上说环境权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具有内在契合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环境权对于人的更有尊严的生活,将更具有现实意义。

结语——抑或问题的开端

“权利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7}因此,历史性与社会性是权利的最本质属性。任何权利生成与保障的逻辑均是基于现实的社会与经济条件,随着社会与经济条件的变化与改善,权利的内涵也会有所发展。在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的三十年中,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提出实行市场经济,最近几年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些社会发展与变迁主旋律中的关键词无疑为宪法上的权利注入了明显的时代内涵。而公平享有发展成果,是我国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建设的最核心命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的充分发展”。^{②8}因此,权利的平等之保障,应是当下人权

^{②6} 参见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4页。

^{②7} 前引①。

^{②8} [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话语的最核心表达。所谓平等,“是指一切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②9}同时,“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③0}当然,这并不否定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也可能在性别上是不平等的”。^{③1}因此,权利的平等之保障,最关键的是对合理差别的判定,法律上的不同条件的设置,如果属于合理差别,则不构成权利的平等保障之违反,反之,则构成对公民权利平等保障的侵犯。

如果说,1982年宪法权利重心的演变属于权利体系内部变化的一个外部反映,那么在我国当下,权利的平等保障则是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最核心命题及最终极价值。对权利研究的任何课题,均须围绕平等保障这一终极价值展开。

On the Logic of Human Right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 ——based on 30 years' Social Changes

ZHANG Zhen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 h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human rights logic,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keeping up with times an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pon 30 year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human rights system of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 has expanded and evolved correspondingly. Firstly, it focuses on the most direct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ights; secondly, it confirms the general values of human rights; and thirdly, it improves the whole system of social rights includ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urrent period, the essential issue and final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 lie in how to enjoy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with social equity and how to safeguard rights with equality.

K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 human rights; rights; social change

^{②9} 前引①,第143页。

^{③0} 前引①,第146页。

^{③1} 前引①,第136页。